

# 第一章

## 历史与共同体

任何历史都取决于其历史目的。这就是以往历史始终为口头传说和文字记述所相传的原因，也是今天专业史学家从公共基金中获得资助，孩子们在学校里学习历史，业余史学会兴旺发达，通俗史著作被列为畅销书之一的原因。有时候，历史的社会目的是模糊不清的。有好些学究喜欢对偏僻的问题进行实地研究，避免与宽泛的解释或当前各种问题发生任何纠葛，只坚持为知识而寻求知识。他们与单调乏味的当代旅游有一个共同之处，仿佛只有把过去当成是人们所逃避的异乡才能利用过去：建筑遗产和风景受到了如此亲切的关照，以至于这种惬意已经有些不尽人情了，社会的苦难、残酷和冲突被排除在历史之外，奴隶制的殖民活动竟然变成了积极的、欢快的事情。一方面，他们不但要留心自己的收入免受干预，而且反过来他们也不会对社会制度构成任何挑战。就另一种极端情况而言，历史的社会目的也是相当喧嚣的：过去往往为战争与征服、掠夺领土、革命与反革命以及某个阶级或种族对另一个阶级或种族的统治而辩护。在不易得到历史的地方，历史却会被创造出来。南非的白人统治者会按照部落和“祖国”来区分城市中的黑人；威尔士民族主义者会在行吟诗人大会中聚集起来；“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国人被迫去创造基层群众斗争的新“四史”<sup>\*</sup>；激进的女

<sup>\*</sup>具体所指不清。——译者注

权主义者会在寻找没有母性的母亲的过程中特别留意奶妈的历史。在这两个极端之间还有许多其他目的，有的比较明显，有的则不太明显。对政治家来说，过去是确立各种具有证实作用的符号的来源：譬如帝国的胜利、烈士、维多利亚时代的价值观、反饥饿游行示威，等等。此外，公众呈现出来的历史也有许多空隙，它们几乎可以同样说明问题：比如俄国对托洛茨基的沉默、西德对纳粹时代的沉默，以及法国对阿尔及利亚战争的沉默，等等。

借助历史，普通人想要理解的是他们亲身经历的动荡和变迁：比如战争、能够使年轻人的地位发生改变的社会转型、能够使蒸汽动力寿终正寝的技术变革、或者是个人向新的社区迁移等等。尤其是家族史，可以使个人产生某种强烈的感觉：他们觉得个人的寿命会延续得更长些，甚至在他们死后仍旧可以存活下来。通过地方史，村庄和城镇可以探索其自身变迁性质的意义，而新来的人则可以在其个人历史知识中增加些根源感。通过在学校教授政治史和社会史，可以帮助孩子们理解和领会他们生活其中的政治和社会体制是如何发生的，暴力和冲突是怎样曾经和继续在该体制的演变过程中发挥作用的。

口述史所形成的挑战，部分是由于它与历史的这种基本目的有所关联。这就是它为什么使有的历史学家如此兴奋，令有的历史学家如此恐惧的主要缘由。实际上，这样害怕口述史是毫无根据的。稍后我们便会看到，专业史学家早就利用访谈作为史料来源了，它与学院派的标准是完全一致的。美国的经验足以清楚地表明，口述史方法会在社会和政治上持有保守态度的情况下被经常加以利用，或者在实际生活中被大力推行，甚至发展到约翰·托兰德（John Toland）在

《阿道夫·希特勒》(纽约, 1976年)中所刻画的对希特勒的同情。

口述史未必就是变迁的工具；它取决于利用它的时候所贯彻的精神。不过，口述史当然也可以成为改变历史内容和目的的手段。它可以用来改变历史本身的重点，开辟新的探究领域；它能够破除师生之间、代际之间、教育结构和外部世界之间的障碍；此外，在历史写作过程中，无论借助书籍、博物馆还是广播电影，它都能通过曾经创造过和经历过历史的人们自己的语言，重新赋予他们在历史中的中心地位。

直至本世纪，历史的焦点基本上还是政治问题：即有关权力斗争的文献编纂，其中，除了诸如宗教改革、英国内战或法国大革命这样的危机时代以外，普通人的生活或者是经济和宗教所起的作用很少受到关注。历史时期是按照王权和朝代来划分的。甚至地方史所关注的主题也只是郡的分区和教区管理，而不是社区和街区的日常生活。之所以如此，部分是因为当时的历史学家本身就属于管理阶层和统治阶级，他们认为只有上述那些事情才是最最紧要的。除非在特定的情况下，劳动者显得比较棘手，否则他们是不会对劳动者的看法产生任何兴趣的；作为男人，他们也不想考察妇女生活所经历的各种变化。然而，即使他们想写不同种类的历史，也并非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因为他们借以写作历史的原始材料，即文献，也是由具有同样特权的人存毁的。文献愈是私人的、地方的和非官方的，就愈是难以幸存。整个权力结果就像一台巨大的录音机，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塑造过去。

甚至在地方记录机构建立以后，情况也依然如此。出生登记和结婚登记、会议记录以及有关贫民救济和福利管理的

记载、全国性的报纸和地方报纸、学校教师的教学日志——各种各样的合法记录被大量保存起来，此外，往往还有好些教会档案和账目、私营大公司和地主庄园的其他账本、甚至像土地所有者这样的统治阶级所藏的私人信件，等等。不过，对男工和女工无数的明信片、信件、日记以及只言片语来说，或者对面街角商店或山地农场这样的小行业所留下的书面材料来说，在哪儿都很难保存下来。

结果，甚至在历史的范围业已拓宽的时候，原有的对政治和行政的关注仍然保留了下来。凡是引入普通人的地方，这些人基本上被当成了从较早的行政调查中产生出来的统计总体( statistical aggregates) 。因此，经济史是围绕着三种类型的资料来源而构建的：工资、价格和失业的总体比率；国家和国际对经济的政治干预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信息；对特定的商业和工业的研究，它所依据的是对个别企业，即那些规模比较大、业绩比较好的公司的记录。同样，长期以来，劳工史也是由此类研究构成的：一方面，是工人阶级和国家之间普通意义上的关系；另一方面，是有关工会和工人阶级政治组织的比较特殊，却很关键的记载；正是这些比较大、比较成功的组织，才往往不可避免地会留下各种记录，或授权编写自己的历史。社会史则仍然特别关心像福利国家兴起那样的立法和行政方面的发展，或者像人口数量、出生率、婚龄、户籍和家庭结构那样的总体数据。在近期的历史专项研究中，人口统计学几乎始终关注着统计总体问题；尽管家庭史显得雄心勃勃，在闯入与情绪和情感有关的历史的过程中常常判断失误，但它所追随的还是以习俗为出发点的社会史路线；至少最近这段时期，妇女史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把精力放在了为获得公民平等，首先是获得选举权而开展

的政治斗争之中。

当然，在所有这些领域内，都有很重要的例外现象发生，这表明甚至对现存的原始资料来说也可能有不同的处理方法。而且，即使在官方记录，如宫廷文件中也有相当多的未被利用的个人信息和普通信息，它们完全可以采用新的方式加以利用。历史写作前后相继的模式，大体上可以反映出这个专业里的绝大多数人在官僚制、国家权力、科学和统计学的时代里拥有优先地位，尽管他们已经不再是统治阶级本身。然而实际情况依然如此，依据文献材料去写作任何其他类型的历史仍然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汤普逊（E. P. Thompson）的《英国工人阶级的起源》（*The Origins of English Working Class*, 1963）和詹姆斯·欣顿（James Hinton）的《最早的店员运动》（*The First Shop Steward's Movement*, 1973 年）就说明了这种情况，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所依据的仍然是受雇的政府通讯员在 19 世纪初和一次大战时期所写的报告。当社会主义历史学家不得不利用政府密探的记录来书写历史时，他们所受到的压抑显然达到了极点。哎，我们确实不能去访谈墓碑，但至少在一次大战时期或追溯到 19 世纪末期，口述史的应用却直接为富有创造性的历史学家提供了丰富多彩的资源。

就最一般的意义而言，一旦各种各样的人的生活经验能够作为原材料来利用，那么历史就会被赋予崭新的维度。就其性质来说，口述史多提供的材料非常接近于公开出版的自传，不过其范围却更宽泛些。公开出版的自传绝大多数都来自于像政治领袖、社会领袖和精神领袖这样的有限群体，甚至当历史学家足够幸运，能够从特定的时间、地点以及他碰巧需要的社会群体中发现自传时，这些自传也很少或没有对

要害问题予以关注。相比而言，口述史学家却可以准确地选择访谈的对象和提出的问题。此外，访谈还会提供某种发现某些书面文献和照片的手段，倘若没有这些手段，这些材料就不会被追查到。学术界的范围已经不再是翻来覆去、卷帙浩繁的旧目录。现在，口述史学家仿佛觉得他们自己就是出版人：设想需要什么证据，就去搜寻和捕获它。

这种新方法对大量现存历史的批判效果，也许就是从新的方向上获得证据。工人阶级政治史学家能够把政府或工会头头们的说法与老百姓的呼声并置起来——显得既很冷漠，又很好斗。这无疑会对更加现实地重建过去提供某些帮助。现实是复杂的、多方面的；口述史的首要价值就在于，相比于绝大多数的原始材料，它可以在更大程度上再造原有的各种立场。不过，这种优势不仅仅对历史写作而言是重要的。绝大多数历史学家都曾做过或隐或显的判断——平心而论，历史的社会目的需要在过去与现在直接或间接的关联中去理解过去。就社会使命而言，现代的职业史学家远没有麦考利（Macaulay）和马克思那样开放，因为学术标准似乎与公开的偏见发生了冲突。然而，不管社会使命如何难以捉摸，它通常都是现时的（present）。历史学家把大量精力和引述都集中在了他们所仰慕的那些社会领袖身上，这当然是容易不过的事情，然而他们自己却从未提出过任何肺腑之见。由于现有的大多数记载在性质上所反映的是权威的观点，因此，历史判断经常为当局的意见辩护是不足为奇的。相反，口述史却可能进行更公平的尝试：证据还可以从下等人、无特权者和失败者的口中说出来。口述史可以更现实、更公平地重构过去，可以向既定的记述提出挑战。只要这样做，口述史就可以使整个历史的社会使命具有某些激进的意涵。

与此同时，对许多种类的历史而言，口述史意味着历史重心的转移。只有这样，教育史学家才会像关注教师和行政人员的问题那样，关注孩子们和学生们的各种经历。研究陆军和海军的史学家才会跳出将军一级的战略和装备问题，而考虑戴有其他军衔的军官和士兵的生活条件、娱乐和士气等问题。社会史学家才会把目光从官僚和政客的身上转向贫民，了解穷人怎样看待救济官，他们遭到拒绝以后如何存活下来的问题。政治史学家才会去接近在家里或班上的选举人；甚至愿意去理解那些比较保守的工人阶级——对调研工作而言，这些人既提供不了报纸，也没有什么组织。经济学家才会把雇主和工人共同当作社会人来观察，并在他们很普通的工作中，更加切近地理解典型的经济过程，以及它的成功和矛盾。

在某些领域里，口述史不仅能够导致历史重心的转移，而且还会开辟出很重要的、新的探索领域。例如，劳工史学家可以最先对绝大多数未曾组织工会的男女工人，及其平常的工作经验以及对家庭和社区的影响进行卓有成效的研究。这些历史学家已经不再囿于那些已经成立工会组织的行业，或者是因罢工或赤贫而赢得当前公众的注意和考察的行业。同样，城市史学家也能够从像贫民窟这样已经被深入研究过的问题域转向对城市典型生活方式的关注：例如小工业城镇或集镇、或者是中产阶级居住的市郊（它们已经构成了社会差别的区域性模式）、邻里间和亲属间的互助、以及闲暇和工作。他们甚至可以从内部来探讨移民群体的历史，这种历史显然在英国已经显得越来越重要，它往往被当成某种社会问题，并从外部出发依据文献进行证明。正是社会史学家才分享了这些机遇——以及其他许多机遇：如对工人阶级闲

暇和文化的研究；或者从常人角度出发对罪犯的研究，这些罪犯常常是些尚未被发现的、能够得到社会些许容忍的偷猎者、扒手和小偷。

不过，口述史最引人注目的特征，或许就是它对家庭史产生了变革性的影响。倘若没有口述史的证据，历史学家就不可能恰如其分地发现普通家庭与邻居和亲属之间的联系，或是其内在的关系。夫妻角色、抚养子女、情感和物质上的冲突和依赖关系、年轻人赢得自立的斗争、求爱、婚内外的性行为、避孕和流产——所有这些，都是十分隐秘的领域。要想搜集这些材料，只有惟一的线索，就是从总体统计以及少量观察者（通常只是部分地）那里去搜集。于是，便产生了历史的贫瘠，迈克尔·安德森（Micheal Anderson）在他那部精妙的、思辨的、却有些抽象的（19世纪兰开夏郡的家庭结构）（*Family Structure in Nineteenth-Century Lancashire*, 1971年）里对此进行了很好的概括：即空洞片面的框架。正因为历史学家目前使用了访谈方法，所以，很可能产生九十年来最丰富的家庭史，从而确立家庭的主要模式，以及时间、地点、生命周期和两性之间的变化。整个儿童史也开始成为可行的。此外，假如家庭的支配力量是借助家务劳动、家庭服务以及在大多数妇女的一生中所具有的母性确立的，那么妇女史的范围也几乎会得到同样的扩大。

在所有这些历史领域里，只要通过自下而上地引入新的证据，转移历史重心，开辟新的探索领域，向某些假设和公断发出挑战，对曾被忽视的实质性群体加以重新认识，便会产生一种累积式的、运动着的转变过程。这样，历史写作本身的范围就会变得广阔和丰富起来，其社会使命同时也会产生变化。简言之，历史变得更加民主了。君王的编年史也关

注普通人的生活经历了。不过，对这种变迁来说，还有另外一个同样重要的维度。写作历史的程序是随着其内容的变化而变化的。对口头只能根据证据的利用，破除了横亘在编年史学家与其读者之间以及教育机构和外部世界之间的障碍。

本质而言，这种变化是由既具有创造性特征，又具有合作性特征的口述史方法造成的。当然，一旦口头证据被记录下来，它就会像所有其他类型的文献资料那样能够为图书馆里的单个学者所利用。不过，倘若我们满足于此，就会丢掉口述史方法最主要的优点：即它的弹性，也就是恰巧在需要证据的地方掌握证据的能力。一旦历史学家着手访谈，他们便会发现自己不可避免地要与他人——至少是他们的信息提供者——共同合作。此外，要想成为成功的访谈员，就必须掌握一套新的技巧，包括对人际关系的理解。有些人几乎能够马上掌握这些技巧，而其他则需要再学一学；不过，与那些上了年纪的专业史学家穷其毕生的积累过程（即对信息的学习和积累在文献分析和诠释过程中的优势）相比，迅速学会成为很有成效的访谈员还是可能的。因此，历史学家在某些方面仍旧保持专业知识优势的同时，还可以成为实地调查员，继而发现自己离开书桌以后，仍然可以分享人类的经验。

正是由于上述这些特点，口述史特别适合于课题工作，它不仅成为群体，也可以成为单个学生的事业：不管是在学校、大学或学院，还是在成人教育或社区中心。口述史可以随时随地落实下去。在国内任何地方，口述史都可以成为地方研究的丰富的主题：如地方工业或手工业史、特定共同体中的社会关系、文化和方言、家庭的变迁、战争和罢工的影响，等等。口述史课题肯定是可行的。特别是在课题的

重心落在当前人们所关注的历史根源的情况下，口述史还会很明确地表明历史研究与当下环境的关系的。

在学校，孩子们已将与自己的家庭史有关的课题设计出来，它提供了能够将其自身的环境与内容更加广泛的过去联系起来的有效方法。此外，家庭史还具有其他两种特殊的教育价值。它可以确立以孩子为中心的观点，因为它把孩子们有关自己家庭和亲戚的知识，对照片、旧书信和文献、剪报的接触，以及各种记忆当作成为课题的基础。同样，家庭史也可以鼓励家长参加学校活动。

孩子们自己的家庭史或许体现了最简单的课题类型。这更适于提出而不是解决历史问题。年龄大些的群体很有可能选择某些更带有集体利益色彩的问题。例如，在牛津大学圣体学院（Corpus Christi College），布赖恩·哈里森（Brian Harrison）带领他的一群学生对学院雇员史进行了一项小规模的研究，这群工作人员对其雇主以前的那种毕恭毕敬、忠心耿耿、谨小慎微以及着装和举止上的忸怩姿态，对今天的大多数学生来说是困惑难解的。通过课题，学生们对学院雇员有了更全面的了解——反之亦然——同时也对历史本身的意义有了更深的理解。正如一位学生所评论的那样：“我同时发现了重要而且有趣的事情……看到了社会变迁对各种生活细节所产生的真正影响……社会环境平常的变化如何改变了传统共同体内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和各种关系”。<sup>①</sup>借助访谈过程中的发现感，当下环境还获得了活生生的历史维度：人们可以意识到那些不为人知、却为自身所能感受得到的过去。对新近来到某个社区或地区的人来说，情况尤其如此。知道住处周围的某些街道或地区在人们到来之前曾经发生过哪些事情是一回事；通过仍然健在的老人心中所回忆起的过

去，体会到在那些特殊的地方所洋溢着的爱、那些特殊的街区居住着的邻里和房屋、那些特殊的商店所特有的亲切感，则完全是另一回事。

这些细微琐碎的事实不仅具有激发作用，而且还是些很有价值、可以利用的历史原料。甚至单个学生在实施暑期课题的过程中也能够通过访谈有效地扩充历史知识，而且还可以创造些别人以后可以利用的新资源。对于群体课题来说，机会自然更多了。访谈的次数越多，档案搜寻工作就会开展得更广泛，研究主题也会变得更加雄心勃勃。

群体课题有好些自己所特有的性质。它需要在知识方面的合作精神，而不是教育中常有的竞争氛围。单独的阅读、考试和授课让位给了合作性的历史研究。参与调查还会使教师与学生之间建立起更亲密的、很少有等级色彩的关系，使他们有更大更多的机会进行非正式的接触。他们之间的关系将会成为相互依赖的关系。教师可以借助对现存资料的知识 and 解释带来各种特殊的经验，但他也必须依靠学生们的支持，因为这些学生正是组织者和实地调查者。通过这种方式，某些学生很有可能会展现出许多意想不到的技能。能够写出最佳论文的学生并不一定是最优秀的访谈员，教师也如此。更加平等的情境被创造了出来。不过与此同时，正因为这些课题可以解决——至少可以拖延——研究与教学之间的冲突，所以它能够使教师成为更出色的专家。群体课题既是研究，又是教学，它们难分难解地交织在一起，结果，每个方面都可以取得更好的效果。

然而，群体课题与独立课题的基本价值还是相近的。在因为这种创造性的历史研究具有起内在价值，所以学生们可以分享其中的兴奋和满足。他们在工作中所遇到的各种难

题，同时还会给他们带来个人经验。他们能够系统地提出解释、阐发理论，然后找出很难进行透彻解释的各种异常事实。他们发现，被访者并不会很轻易地符合准备材料上所描绘的社会类型。他们需要证明的是那些让人可望而不可及的事实、人物和记录。他们会遇到各种偏见、矛盾以及诠释证据等方面的难题。学生们最先要做的就是，从书面历史的宏伟模式中解脱出来，返回到该历史的基础，即很难处理的个人生活。

这两类课题还会产生很重要的后果：即把教育从其制度的避难所中解救出来，带回到世界里去。这样，双方都会由此获益。访谈可以把来自不同社会阶级和不同年龄群体中的人召集起来，否则，他们很难相聚在一起，更不用说相互间亲密的理解了。好些人之所以对学生怀有普遍的敌意，是因为他们对学生实际上是什么样的人，他们究竟要做些什么还很不了解，这些会见会使他们对自己心中普遍存在的担心和成见进行重新估价。这些课题还将表明，历史并非与普通人的生活毫不相干。相反，师生们会进一步直接意识到他们呈现给广大公众的形象。通过走进信息提供者的生活，师生们会对其未曾有过的价值观进行更深的理解，并常常对比他们更少拥有特权的生活所展现出来的勇气产生敬佩之情。

不过，更根本的是，访谈还意味着教育制度与生活世界之间的界限，专家与普通公众之间的界限。历史学家开始学习访谈了：他们之所以要拜人为师，是因为人们来自不同的社会阶级，或者所受的教育比较少，或者年纪比较大，他们可能了解更多的事情。重建历史本身成为了越来越需要广泛合作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非专业人员必须扮演批评的角色。正因为把写作历史和呈现历史的重心地位让位给了各种

各样的人，历史才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此外，尤其是老人受益良多。口述史课题不仅能够给这些老人带来更多的社会接触，有时候还会带来持久不断的友谊，甚至提供给他们料想不到的服务。尽管他们常常被人忽略，经济上也软弱无力，但在追忆自己的生活并把有价值的信息提供给年轻一代的时候，他们仍然会产生尊严感和实现感。

只有口述史才有可能实现这些变化，但这些变化也不仅限于著书立说和实施课题。它们还会对博物馆、档案馆和图书馆所呈现的历史产生影响。目前，这些机构都有能力将生活融入到收集工作之中，并借此使其自身与社区之间建立一种更加积极的关系。它们可以成立自己的研究课题，如有关伯明翰城市洗澡堂和洗衣房的研究，南安普敦西印度港的社区研究，帝国博物馆对早期飞行术的研究计划，以及对出于良知而拒服兵役的研究计划等等。近几年来，英国的许多博物馆都是口述史课题的发起者，他们通过人力服务委员会（Manpower Service Commission）为失业青年寻找短期工作，这不禁使人想起美国新政时期的联邦作家项目（Federal Writers Projects）。埃蒂那·伯纳德（Étienne Bernard）发起的“生态博物馆”计划（the “ecomusée” programme）便是一种颇受注目的想法，该计划提出了无建筑博物馆的设想，即通过社区来实施录音课题，借用四邻五舍的照片和实物——用完了还会还给他们——举办临时性的展览。有趣的是，曼彻斯特犹太博物馆便是曼彻斯特口述史研究项目的产物，该项目是由工艺专科学校的比尔·威廉斯（Bill Williams）发起的，它促使城市里的犹太社区挽救了已经关上大门的维多利亚时代的犹太教堂。如今，该教堂作为永久性的博物馆已经开放了，在那里，当你凝望着那些捐献

出来的实物展览时，你可以拿起电话聆听有关这些实物的回忆。在厄迪哥 (Erdigg)，也就是近期开放的国家在柴郡托管的房子，你可以穿过仆人居住的房间，听到最后一代仆人及其主人的声音。

口述史研究还有助于展览本身更接近于历史的本原。对各种实物来说，其“时代背景”往往换成了重新搭建起来的真实的房屋：比方说，屋子里横七竖八地摆放着各种工具、刨花和尚未编成的篮子，就好像工匠们正在使用这间屋子一样。确实，在某些博物馆里，这种工作一次又一次地被利用起来；有好些博物馆，就像希罗普郡阿克顿·斯科特 (Acton Scott) 那里的劳动农场博物馆一样，对古老工序的记录工作和日常使用成为整个口述史事业环环相扣的宗旨。当上了年纪的当地人看到这种博物馆时，他们很有可能品头论足一番，甚至把自己的东西拿出来，帮助博物馆改进陈列。在充满生气的东伦敦博物馆，倘若馆员们听到了这类谈话，就会马上提醒馆长注意，他们会立即送给老人一杯茶，并适时地把他对这个地方的印象记录下来。在绝大多数的社区课里，有好些录音都被用来制作当地学校所使用的教学磁带；在周末，还会安排学生——通常是六年级学生——会见老人。这样，在老年人、他们自己的地方史以及已经变成社交中心的博物馆三方之间形成了积极的对话。这里所塑造的与历史有关的社会角色模式，既又有很大的潜力，也需要在别的地方继续开展下去。

要想在广播中把历史展现出来，当然得坚持不懈地应用访谈。就此而言，各种口述史技巧确实是多年来形成的好传统——实际上，这些技巧很有可能在“口述史”这种说法出现之前就有了。当然，专业历史学家也有了自己的机会，他

们可以在第三广播电台（Radio Three）的节目间隙中做简短的演讲。不过，我认识的很多人都表示，他们更喜欢这样的广播和电视节目：这些节目能够通过利用原始材料（有的来源于原初时期，有的则是回顾性的记载）将历史重新焕发出来。对未来的历史学家来说，将大量的这类节目同英国广播公司录音档案馆内的其他节目保存下来，将会为历史研究提供一个丰富的源泉。然而，非常不幸的是，目前只有正在电视中播出的少量节目被保留下来；同样令人吃惊的是，历史学家很少注意到这种录音制品被系统销毁的情况。

在历史广播中，正是有了大众，即那些原发的行动者的参与，这些节目才能够变得丰富多彩。某些地方广播电台通过听众之声节目，把广大听众调动起来，让他们或者寄回自己的评论，或者提出被轮流访谈的建议，这些广播电台巧妙地利用这类节目，促进了与当地社区的联系和交流。斯托克广播电台（Radio Stoke-on-Trent）的这种每周系列节目连续广播了两个年头。伦敦周末电视台的系列节目《现代伦敦的形成》，也始终与当地学校、老人活动中心以及单个电视观众所参与的课题竞争联系在一起。为了制作《汽车制造》系列节目，电视历史工场（Television History Workshop）开放了工厂附近的车间，以便于收集材料并对广播类的节目做出回应。不过，给人印象最深的广播实验也许是在瑞典完成的。本格特·简森（Bengt Jansson）通过瑞典教育电视台组织了有关社会变迁（“Bygd I frövardling”）的系列节目，该节目把目光集中在了这个国家的两个地区，在当地，有七百余与节目相关的讨论圈子被建立起来，把共约八万人召集在一起，参与交流他们毕生的历史经验。

在制作电影方面，也始终有人尝试去利用口述史。不

过，在制作电视和电影的过程中，常常会出现许多问题，访谈系列很容易交织在一起，造成视觉上的重复，尽管某些片段显得很生动，却缺乏戏剧性。一旦人们利用了老影片，它便会提供一个有效的比照。还有一种不同的办法，就像罗德·布莱思（Ronald Blythe）所拍摄的（阿肯菲尔德）（*Akenfield*）一样，让当地群众参加某些镜头的拍摄，他们所说的话也没有经过事先编排。每到周末，这些群众总会无偿地为该片提供服务，带来每个片段所需要的衣服、道具和食品。他们只是被预先通知所要拍摄的镜头是什么，再按照这个要求穿上合适的服装，调整好恰当的心态。如果有的影片拍起来比较棘手，这样做当然会取得显著的效果。正因为这些人非常普通，所以影片的某些片段是感人至深的：譬如葬礼的次序，尴尬的沉默，刚刚到来时的不当措辞，吟唱圣歌时的凝缓，以及随后人们所不厌其烦讲述着的各种恶作剧和坏故事。不过，有些看过影片的人也觉得它平淡无聊，谈不上什么新奇之处。推其根源，主要是其缺乏生动的情节。

正因如此，戏剧中某些类似的实验才被证明是更成功的。安吉拉·休因斯（Angela Hewins）的《迪伦》（*The Dillan*），便生动地记述了乔治·休因斯（George Hewins）的生活。乔治虽然拙于写作，但在讲故事的时候却有着少有的天赋。他是个孤儿，是在艾冯河畔斯特拉福德的一个寄宿房间中的由祖母养大的，他还是个为谋求生存而斗争的临时工人，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壕里负过重伤。乔治·休因斯的生活经历曾经被编排成剧本，由皇家莎士比亚公司排演过。该公司拥有一个得到了一百五十位当地自愿者支持的专业演员骨干，这些自愿者自制服装并成立了自己的乐队；实际上，演出也是在远离剧场的地方进行的，如城镇四周、公

园风景旁的歇息处、建筑工地、河畔或者是废弃的铁道旁，等等。每天晚上，大批的人都会熙熙攘攘、接踵而至，大大超过了原来的观众数量，在草地外，在幕间集市般的氛围中，你会听到他们三人一群、两人一伙地交流着他们对这个地方的回忆。在把一次大战的布景拆下来，塞到一个军用帐篷里去，演出在由演员、观众和旁观者共同参与的火炬和平游行中达到高潮，此时此刻，足有七百多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地返回城镇。这是一种风格全新、极为动人的社区戏剧形式。还有其他某些公司，如时代交换公司，以更加朴实无华的方式发展了以口述史料为基础，在农庄会堂和社区中心进行的演出工作。然而，在绝大多数这样的工作中，尽管台词，甚至是表演都是由当地群众排演的，但是其基本的路数却还是由别人规定的。即使存在一种共同的目的，那也是由外部强加给它的。

对以怀旧为主题的戏剧来说，还有一种可供选择的办法，如埃利西·道奇森（Elyse Dodgson）为伦敦许多学校创立的参与性戏剧（participatory drama），现在，这些剧目已经以皇家青年剧院为班底了。在这里，孩子们从自己的家庭中搜集素材，再共同编排、共同演出，这些高质量的演出曾经给人以非常深刻的印象。不过，由于各种技术要求，传媒的费用以及国际职业制度对传媒的支配，在排演戏剧和制作电影的过程中无疑会遇到许多特殊的难题。国家广播事业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不过，尽管选择很难，但还是要大量其他类型的课题，尤其是教育课题中做出选择。这是因为，口述史方法的合作性质已经开始对历史与共同体之基本关系的问题提出了激烈的质疑。专业史学家不必再为了解释和呈现历史而把历史信息与共同体分离开来。通过口述史，我们